

东亚模式的新格局

D O N G Y A M O S H I D E X I N G E J U

——创新、制度多样性与东亚经济的演化

贾根良 梁 正 等著

史也这个行业重为国米
种它于进工加史我后
一、基境方将历史，现
求式。情西必和条实
追模题定仿且化的争
孩超主特模而文利力
应赶大的在、有次
国非宏生效展理更一
我而的产力发地了下
，赶途能意式、供和
国迫前可注越态提备
大是类有把跨生家准
的式人”果现的国行
中模乎式”果现的国行
展亚关模如实他进
发东个国、法我其中
于这个”中不仅技术长
合式”“我们不仅技术长
这模展对我们不仅技术长
不发展了我，们物耶希
并发展了我，们物耶希
战略特提出。上我生手希
略济特提出。上我生手希
战经可我们课道机息德常
向的括“我大制危信康非
开放包虑的福生发五还
出口能考的球们第上
出加未些研化全我在居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青年项目

南开大学教育振兴计划资助项目

贾根良 梁 正 等著

东亚模式的新格局

——创新、制度多样性与东亚经济的演化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梁晋华
复 审：张文颖
终 审：张彦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亚模式的新格局：创新、制度多样性与东亚经济的
演化 / 贾根良，梁正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4

ISBN 7-203-04534-X

I. 东… II. ①贾…②梁… III. 经济发展—经济
模式—研究—东亚 IV. F13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977 号

东亚模式的新格局

——创新、制度多样性与东亚经济的演化

贾根良 梁正 等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铁三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20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

ISBN 7-203-04534-X

F·401 定价：18.00 元

前 言

世纪之交,东亚经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之中。然而,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研究热潮的消退,东亚研究也陷入了某种僵局。学术界和一般大众似乎都认为,短期内东亚研究不会再有创新性的作品。1998年初,当我们完成《亚洲金融危机启示录》之时,就感觉到了东亚研究的艰巨性。确实,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中被主导舆论所否定的三种主导学说,新自由主义东亚发展观的兴起,世界体系学派仍对21世纪东亚光明前途的坚信不疑,所有这些相互冲突的学术观点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和知识结构下,都会使我们陷入无所适从的迷离状态之中。简言之,东亚研究出现了范式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求本书各章作者在思考东亚模式的同时,加大对经济学方法论和基础理论最新发展的学习。本书就是在我所提出的演化经济学新框架之下对东亚模式的历史作用、新形势下的局限性及其变化趋势所做的研究。对于国内有关东亚经济研究来说,本书不仅大幅度地提供了全新的知识结构,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

本书正文由一个导论和十二章所组成。导论在对世界体系学派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通过对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的方法这两个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在东亚模式上的最新研究进行整合,提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东亚发展新学说。我们认为,经济危机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状态,东亚危机虽更具突发特征,但它并不比美欧地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危机更为严重。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说明东亚制度是无效率的和非理性的,相反,却是有

其特点的创新体系,危机的爆发是其成功而非失败的结果。遵循批判现实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我们运用创新体系的方法对东亚模式的精髓进行了提炼,并把它看作是东亚模式未来创新的重要基础。然而,作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东亚模式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从全球视野来看,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具有直接的联系,同时在相当大程度上它也是体制发展模式调整滞后的结果。经济社会演化的阶段性特征说明,任何时期都不存在不随时代而因应变革的发展模式,正如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欧经济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一样,东亚模式的革新也势在必行。在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时代转变”之中,东亚地区如何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使东亚模式的精髓得到创造性的发挥就构成了本书以后各章的主题。演化经济学新框架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把这种研究放在更深邃的时空视野之下,也就是把它与世界体系演变的结构制约条件、东亚地区特定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研究,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我国在未来的东亚格局中如何实现后来居上的历史脉络和特定情境,制定切实可行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开创东亚模式的新格局。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还通过揭示东亚研究中原有三种主导学说的内在缺陷,把其合理成分纳入到更广阔的视野之中,批驳了东亚研究中轻率和简单化的做法,从而实现了范式的突破。作为前言,下面我将分五段扼要概括一至十二章的新方法、新观点和新的政策建议,略微详细的陈述请参看导论的第三部分。

第一章和第二章从长波运动的角度考察了世界体系中“东亚奇迹”及其危机的历史过程。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我们就在国内外率先采用这种方法对此进行了解释,但当时应者寥寥。后来读到调节学派近似的解释,这促使我们对这一问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第一章提出了“基础创新扩散”的“中心—外围”假说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长波运动在外围地区的“传递”和“变形”理论,揭示了

整个东亚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新重商主义和以“模仿型创新”为特征的技术转移机制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并讨论了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上升期对东亚地区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第二章首先从市场规模的角度分析了新重商主义在东亚发展过程中曾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而结合调节学派的论述,运用杨格定理重新考察了东亚区域内分工体系的产生、发展和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变化,借鉴欧盟经验,提出了“东亚的未来在于构筑起高水平横向分工体系,从而通过扩大内部市场规模为自主创新提供基础”这一全新的观点。

正如克什格隆曾指出的,经济愈落后,国家和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愈大,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宏观制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政府主导和使其金融体制服从于“追赶”战略的需要。目前,日本金融体制处于危机之中,政府作用需要重新定位。第三章重新评价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条件下东亚国家与地区对政府作用的重新定位。第四章是对日本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危机的研究,重点分析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银行与企业、家庭部门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第五章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金融体制的比较研究,总结了后发工业化经济在金融体制建立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共同规律,并通过对发展战略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它们在金融体制选择上的差异,尤其是重点研究了带有明显“双重结构”(“地上”与“地下”,“岛内”与“岛外”)特点的台湾金融体制的形成原因及其演变趋势,还特别指出了台湾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企业“代工”网络的兴起与地下金融之间所存在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在国内文献中尚未见提及。

从第六章到第八章,是对东亚地区(以日、韩为例)企业间关系形态和企业治理结构与机制等微观制度的考察。第六章在借鉴国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动态博弈方法研究了日本企业层级式

下包网络的“精巧结构”,运用复杂系统自组织理论指出了这种网络在“信息处理”上的缺陷,运用网络分析方法重新考察了日本企业集团内部的关系纽带,提出了多维纽带、战略协同和“网络定位”等新观点,据此做出了日本企业集团未来将向“战略联盟型”转变的预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我国“抓大放小”和构建企业集团战略的政策建议。第七章结合历史,研究了韩国企业集团间“同构化”现象、“全方位竞争”格局出现的根本原因及其内在“合理性”(不同于“发展失谬论”),指出了由此所导致的产业组织深层次矛盾及其对我国的警示。第八章运用新金融中介理论,重新考察了日本企业“双重治理”模式的特点,通过对日、美治理模式的绩效比较,否定了日本企业治理模式“无效论”的观点,以韩国为典型,总结出了后发工业化国家“内部治理”型模式的一般特点及其问题所在。

基于我们对东亚地区宏、微观制度的比较研究,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进一步讨论了东亚产业组织模式、创新体制和东亚模式的文化基础,这一部分在中文文献中是全新的研究。第九章使用调节学派的方法与概念框架,追溯了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变的历史起源,简评了作为后福特制产业组织先驱的日本模式。该章的大胆尝试就是把台湾和香港作为新工业区在东亚重要的表现形式,考察了以“意会性知识”为基础的地方化生产与全球网络在台湾和香港“发展奇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为我们在全球化条件下创建地方化创新体系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全新视角。第十章从比较的角度集中讨论了东亚科技创新体制的利弊得失。我们认为,导致日本战后经济成功的创新体制虽有其独特优势,但由于基础研究和大学体制等方面的落后,它无法适应激进创新的要求,从而导致了跨越式科技发展的失败。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韩国和我国台湾的经验说明,进入跨国企业技术网络是发展中国家与地

区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当地企业间技术网络的不同安排及其发育程度导致了“集体学习”效应的重大差异。我们从韩国和我国台湾的比较中所得出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如何处理大中小企业间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十一章运用“脉络与情境”分析方法,通过对日本模式和“鞍钢宪法”这两种后福特制先驱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地探讨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部既有的变异、与西方文化的杂交和自身的突变在东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能动作用,并扼要说明了儒家文化圈的“中心—边缘”结构与东亚国家与地区经济“起飞”时间序列的关系。东亚国家与地区经济“起飞”的时间序列和“鞍钢宪法”的历史教训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任重而道远。

本书的最后一章首先讨论了东亚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出口导向战略并不适合于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应该追求一种更加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模式是追赶而非赶超模式,它也未能包括“可持续发展”这个关乎人类前途的宏大主题。基于这些考虑,我们提出了对“中国模式”有可能产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们认为,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模仿西方工业化的福特制道路上,不仅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且必将加重全球生态危机。我们发现,我国的生态、地理、文化和历史为我们发展信息和生物技术比其他国家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我国在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进行准备和下一次力争实现后来居上还是非常有希望的。但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在不同层次上包容从前福特制、福特制、后福特制到更高级后福特制跨越的“时空压缩”,“中国模式”必须是致力于跨越但又兼收并蓄的多样化模式。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抓住信息产业和生物技术“机遇窗口”,发挥我国人力资源和传统知识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政策建议。在多样化组织培育方面,我们提出了三种对中国有重要意义的组织

模式,即与成熟产业改造有关的日本式下承包网络、与自主创新有关的美国式“产学研政”横向互动网络、与“特质”产业知识生产相关的中国式产业区和企业集群模式。最后,为适应“中国模式”在以上各方面的发展,我们在东亚经验基础上,又提出了政府的四种新职能,这就是防止制度锁定、促进集群、保持宏微观条件的配合和致力于生态发展。

本书是在项目负责人贾根良教授主持下,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年轻教师和博士研究生集体研究的成果。项目大纲的设计和思路的提供均由贾根良负责,梁正和王晓蓉协助对全书做了部分修改。本书各章作者如下:导论,贾根良;第一章,梁正、姚国庆;第二章,姚国庆、梁正;第三章,宁光杰;第四章,曹华;第五章,张峰、梁正;第六章至第八章,梁正;第九章,王晓蓉、梁正;第十章,王晓蓉、贾根良;第十一章,贾根良;第十二章,贾根良、梁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对副总编张彦彬先生和责任编辑梁晋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我们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运用于东亚研究的初步尝试,但由于我们对前者研究的水平有限,特别是由于东亚发展将会出现我们未曾预料到的一些新变化,本书难免存在不妥和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希望得到批评指正。联系地址:南开大学经济系;邮编:300071。

贾根良

2002年1月1日于南开园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长周期变动、技术传递机制	
与“东亚奇迹”	(42)
第一节 长周期理论的简单回顾	(42)
第二节 第四个长波下降期与东亚的崛起	(47)
第三节 长波下降期中的技术传递机制	(52)
第四节 第五个长波上升期的来临	
与东亚面临的危机	(60)
第二章 新重商主义与东亚区域内	
分工格局的演变	(72)
第一节 市场规模、新重商主义与东亚模式	(72)
第二节 东亚区域内分工与雁阵模式	(84)
第三章 政府作用与东亚经济发展	
——重新评价	(96)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的理论分析	(97)
第二节 东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历史的实证	(102)
第三节 新形势下政府作用的重新定位	(123)
第四章 日本金融制度	(131)
第一节 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严格管制下的金融制度	
与银行的作用	(132)
第二节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本金融结构的变化	

及对银行的影响·····	(139)
第三节 日本金融“大爆炸”式改革 与银行作用的展望·····	(149)
第五章 韩国与中国台湾的金融制度 ·····	(155)
第一节 韩国金融制度·····	(155)
第二节 台湾的金融体制·····	(167)
第六章 日本企业间关系形态研究 ·····	(180)
第一节 概 述·····	(180)
第二节 企业间垂直关系——下包制研究·····	(181)
第三节 独立系企业集团内部关系形态·····	(204)
第四节 财阀系企业集团内部关系形态·····	(210)
第五节 日本企业集团存在的问题及其转变前景·····	(223)
第七章 韩国企业间关系形态研究 ·····	(233)
第一节 韩国大企业集团内部关系形态考察·····	(234)
第二节 韩国大企业中小企业关系考察·····	(245)
第八章 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 的比较研究 ·····	(254)
第一节 概 述·····	(254)
第二节 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及治理机制·····	(255)
第三节 韩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277)
第九章 后福特制与东亚模式 的产业组织基础 ·····	(290)
第一节 产业组织模式:从福特制 向后福特制的转变·····	(291)
第二节 日本模式·····	(303)
第三节 地方化生产与跨国网络·····	(306)
第十章 创新体制与东亚科技发展 ·····	(319)

第一节	日本科技创新体制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	(320)
第二节	企业间技术网络:韩国与我国台湾 的比较及其借鉴·····	(332)
第十一章	文化变迁与东亚模式 的历史性透视·····	(347)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变迁·····	(347)
第二节	东亚模式的文化解析·····	(356)
第十二章	东亚经验与21世纪“中国模式” 的战略性思考·····	(370)
第一节	东亚经验的历史局限性与“中国模式” 的特定情境·····	(370)
第二节	中国:长波运动中的产业与市场战略·····	(377)
第三节	为组织革命准备条件:多样化模式·····	(382)
第四节	金融制度与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	(392)

导 论

好奇心往往产生于对事物的惊异。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什么会使流行的学术观点对东亚模式^①的评价产生了惊人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高度赞扬到90年代末的贬斥之声不绝于耳？这种随经济形势的变化所产生的剧烈摇摆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目前我们对东亚模式的研究是否包含着相当大程度的静态和简单化的做法？现有的研究成果是否缺乏更宽广和更深邃的历史视野？具体而言，在理解东亚经验上，几年前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热潮到底是提供了比从前更多的帮助还是使我们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迷离之中？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挑战，对上述问题的长期思考促成了本书的撰写，其目的就是通过重新总结东亚模式的历史经验，展望未来变革的方向，为中国经济的复兴提供有益的借鉴。为了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本篇第一部分首先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与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东亚发展观相对抗，作为演化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分支，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的分析方法分别对东亚模式提出了新的学说。我们所谓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就是对这两者进行整合的结果，它不仅对认识东亚模式的历史作用及其变革方向提供了深邃的时空视野，而且，还把原先争论不休的三种主导学说的合理成分纳入其中，批驳了东亚

① 本书的东亚概念并不出于地理学的考虑，而是一个在全球世界体系中对东亚研究所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特别是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与东南亚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它涵盖了东南亚国家。但由于东南亚“外围福特制”发展的某些迹象，本书所谓东亚模式实际上主要是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程式化事实”的概括。特此说明，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研究中普遍流行的轻率和简单化做法。第二部分运用上述新框架对东亚经验的精髓进行了提炼,其目的就是为了肯定东亚模式的历史作用。我们认为,东亚金融危机不仅并未损伤东亚模式的基本架构,反而使其深层的潜意识结构闪现出来了,这是东亚模式未来创新的重要基础。至于如何通过制度和政策改革,在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时代转变”之中使之发扬光大则是本书以后各章的主题。为了读者阅读的便利,第三部分则对本书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发现做了概要性的说明。

一、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东亚模式的评价已发生惊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东亚成功的三种学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一些经济学家从东亚经验中概括出了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一时间它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楷模,“21世纪将是东亚经济的时代”成为当时流行的看法。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从克鲁格曼对“东亚奇迹”提出疑问开始,持不同意见者逐渐增多,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已使流行的学术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原先占主导地位的三种学说遭到批判和否定,人们也普遍看淡东亚经济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的方法开始介入东亚模式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对新自由主义东亚发展观持反对态度的两种新学说。我们首先简述这两种新学说的理论渊源及其基本分析框架,然后分别讨论它们对东亚模式的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之上,最后我们将说明这两种方法的互补性及其整合的必要,从而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

(一)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分析方法的理论渊源及其基本架构

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分析方法是目前正在兴起的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坚决反对新古典主流

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其发展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主题:第一,制度重要。制度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结构,没有制度就不可能有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交互行为。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意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的下述看法,“讨论交换过程,却不指明交易得以产生的制度环境,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这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①。第二,经济只是社会文化复杂关系网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制度就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方面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因此,他们不仅反对以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而且与“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②有很大不同,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对于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了同样的关注。第三,历史重要。这里的“历史”并非简单地指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把经济过程看作是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因此,他们拒绝主流经济学所谓任何短暂发展基本上是可逆的这种不现实的假定。第四,制度多样性。制度变迁是一种把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歷史过程,由于它自身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因此制度演化对每个社会来说基本上是特异的。制度多样性说明了每种体制的优势将与劣势同时并存,在一国行之有效的制度并不一定在另一国也产生令人满意的绩效,帕累托最优境界是不存在的。正是在以上四个主题基础之上,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分析方法通过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为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所承续的学术传统不同,他们在分析框架上形成了相当不同的概念体系。

调节学派发端于法国巴黎,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调节(regulation)”这个概念在法语中更接近于系统

① 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第58页。

②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论的含义: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正如 Jessop 指出的,“调节”这个动态概念强调了,在与资本主义不稳定变化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特定条件下,历史上因事而变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交互作用导致了经济行为者所采取的行动。调节学派虽然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的重要性,但拒绝后者对经济行为者能动性的忽视。他们认为,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相当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取决于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多样化结合的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因事而变和不确定的,只有某种能够容纳其内部冲突和矛盾的调节模式才能使之成为可能。调节模式则是使资本积累结构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形式的突现性系统。20 世纪 80 年代,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它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十年来,调节学派的发展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经验分析的范围来看,他们已突破了局限于美欧国家的做法,扩大到对转型经济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第二,理论发展突出了调节空间(space of regulation)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把注意力从给定空间的调节转移到调节空间的积极创造上,而且,对调节空间的兴趣已从民族国家转向调节空间的多梯级(multi-scalar)性质上。

创新体系分析方法所承续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于熊彼特。战后,“新熊彼特”在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创新体系文献作为其组成部分,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它的发展目前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集中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Lundvall, 1992; Nelsen, 1993),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则着重于地方性创新体系的探讨。从本质

上说,创新体系文献的出现和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研究的重点就在于从地方到国家如何通过建立独特的和多层级的创新体系,从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保持持久的竞争力。创新体系文献的基本假定是,世界经济的演进已大大降低了自然资源禀赋、低工资成本和价格削减等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而使新产品创造、产品质量改进和以新的方式进入特定市场的能力愈来愈重要,这种变化已使知识创造成为全球竞争的关键性因素^①。但知识创造并非个人或单个企业的事情,而是一种集体性的交互学习过程,它取决于非常广泛的相关知识的积累与发展。这些知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可整理知识与意会性(tacit)知识(Polanyi, M., 1962)。可整理知识是指可以用语言和符号表达且易于交流的知识,而知识的大部分却是无法言传的,它主要是通过实践和实例来学习,正如凡勃仑和尼尔逊等所指出的,产业技术中相当大部分的技能属于此类,这被称作意会性知识。由于信息革命极大地方便了可整理知识的传播与吸收,由此所引起的模仿与竞争已使竞争力维持的时间大大缩短。相反,意会性知识无法以信息的形式加以传输,难以为竞争对手所模仿,因而对于维持竞争力更为基本。意会性知识的发展依赖于经常的和面对面的交流,它是胶粘于特定空间的知识形态。所以,在知识创造过程中,意会成分越多,相关行为者在地理、文化、社会关系和组织等方面的亲和力就越重要。当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亲和力时,我们就会发现,在不断发展的全球知识经济中,这种亲和力在不同层级上就表现为从地方经由国家再到区域等多维知识创新体系。

调节学派与创新体系的分析方法分别运用上述框架对东亚经济进行了研究。在调节学派中,2000年由老资格的代表人物 Boyer 编辑出版了《危机中的日本资本主义:调节主义的理解》,这部书

^① Maskell, P. and Malmberg, A., Localised learning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3, No. 2, 1999.